

■新作聚焦

鲁敏短篇小说集《梦境收割者》：
都市即景与现代经验

□曹霞

在多年来的叙事探索中，鲁敏一直是一个“冒险主义者”。她不断“变形”，不断寻找新的叙事领域，为现代性进程中的都市生活源源不断地提供着新的面向。

提到鲁敏，人们大抵会想到“东坝”和“暗疾”，它们几乎可以与“鲁敏”这个名字画上等号。不过，她近期出版的小说集《梦境收割者》却顽强地抵抗着这两个标签。10篇小说或长或短，或丰沛或简洁，展露着另外一副笔墨和心肠。

单看书名，我们可能会产生一种虚实相间、真梦难辨之感，这里面包含着鲁敏的聪慧遐思和文学性构想。对于深受《红楼梦》熏陶的中国作家来说，写作和人生都是一场大梦，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可以自足自洽地反复推演。就像集子中的《有梦乃肥》，梦与现实的边界相互散开，彼此缝合。甜晓患有梦症，所做之梦竟然部分或全部实现。这个“特异功能”使她成了众人追随的“梦婆”。真梦不够的时候，甜晓就开始做梦。奇特的是，那些听到假梦的人，比听到真梦还要醍醐灌顶。到底是他们在收割梦境，还是他们被梦境收割了？

除《有梦乃肥》外，其余篇章均不涉及做梦，而是布满了琐碎真实的质感：《无边无际的游泳池》讲述都市男女的相亲，《在四十七楼喝酒》关乎不同婚姻场景的对比，《或有故事曾经发生》探寻女孩烧炭自杀之谜，《写生》展现了当下流行的慈善拍卖，《绕着仙人掌跳舞》取材于某大学教授换妻的真实事件。《球与枪》并不是真的“球”与“枪”，而是我我无比熟悉又切齿痛恨的摄像头。《赵小姐与人民币》直白而反讽地对比了狗的生活费和人的生活费，孰轻孰重，孰贱孰贵，都市人满腹辛酸，想撕张人民币泄愤，想了又想，还是把百元大钞换成了最小面额，撕完后又仔细地粘好……这些故事仿佛是即时抓取的都市小景，让人倍感熟悉和亲切。

小说的另一重力量来自于它的情绪和经验处理策略。鲁敏敏锐地意识到，都市在给人们带来体面和成功的同时，也开始了对于人的大面积的修改和异化。孤独、隔膜、疏离、创伤，都是都市生活携带而来的现代经验。《梦境收割者》中的关系都是很传统的，如父子、夫妻、情侣，然而他们之间已经失去了亲密和信任。就像英格玛·伯格曼的《野草》《秋天奏鸣曲》《婚姻生活》，即便是家庭成员之间也陡峭地矗立着灰色的高墙，对话如同梦呓，亲热如同博弈。用安东尼·吉登斯的话来说，一切都“脱域”了。

鲁敏通过表面繁华喧嚣的都市场景，道出了现代社会的孤独体验。《在四十七楼喝酒》中，晓玫是一个标准的贤妻良母，因与丈夫争吵而离家出走。她在大学同学NONO家借住一晚，以夜不归宿来反抗完美的自我形象。在NONO居住的47层公寓，她发现离婚后的老同学是如此陌生，而自己

那两个正在追求NONO的男人一样，虽然热闹地喝酒聊天，却陷落于不知所云的心狱。“他们因为孤独而聚会，并在聚会之后又收获更多的孤独。”摩天大楼的悬空感就是都市孤独的标配，NONO这个空无所有的名字也包含着作者的隐含意指。

一种孤独的情绪流在小说中起伏着、涌动着：玩单词斩的出租车司机是孤独的，货比三家的赵小姐是孤独的，交换配偶的夫妻是孤独的，拍下诗歌课的“钱祖宗”是孤独的。《或有故事曾经发生》中的米米或许也是因为孤独而走上了不归路。这个自主创业的女孩自杀了，留下遗书说与任何人无关，不但没有查到女孩自杀的真实原因，就连米米长什么样子、过着什么样的生活也成了一桩“罗生门”，以至于我们会产生这样的感觉：对于米米来说，活在这个无爱、无情、无趣的人间，还真不如自杀。

这样说似乎很残酷，但却是一种真实。在当下现实中，越来越多的惨案如影随形，让我们不得不承认高度发达的都市同时包含着自我异化，比如《球与枪》所涉及的“身份”和“人格”的分裂。在小说中，执法人员根据摄像头拍到的资料寻找罪犯。有意思的是，他们找到的不是真正的罪犯AB，而是小公务员穆良，原因是他们长相酷似。作者的设置不难理解，穆良和AB是一个完整人格的两面：一个安分守己地度日，一个身手矫健地犯罪。“这世上不止我一个”这种身份认知看似不确定，却强化了他们与现实的黏合度。这种设置类似于基耶斯洛

夫斯基的电影《两生花》：两位分别出生于波兰与法国的少女薇罗尼卡从未相见，却深切地感受着遥远国度的另一个自我。两个薇罗尼卡的相互感知构成了唯心/唯物、现实/理想等一体两面的生命镜像。

《梦境收割者》中有一些小说涉及了“身体”，这并非突如其来，也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私人化、消费主义中感官化的“身体”大相径庭。在鲁敏看来，身体是比灵魂更为真实的存在，同时也是更易朽坏的外壳。她专心探讨身体的变化，以使生命的哲思有所附丽。在《无边无际的游泳池》中，以泳池为背景烘托出的身体差别何其之大。童年的身体甜美如人参果，到老年时却极度衰朽，连老头和老太太都难以区分，也难怪人们势利的生理反馈往往亲狎于前者而力避后者。时间的伟力对身体进行着“退化”式区分，逐渐消灭了身体与身体的巨大差异，直至最后消灭身体本身。

这种思考和表述在《火烧云》中抵达了简洁有力又繁复有序的禅意之深。居士与女客分别作为隐修和红尘的代表，在山上的“云门”相逢。一个是在有意意识的隐居中饱受身体微恙的烦恼，不堪其苦；一个是在无心的逃避中承受着生育重疾的大苦，却心无挂碍。居士无法忍受女客沉醉于往事的絮叨和对世俗之物的眷恋，先是镇日抄经，后下山还俗。小说在时下流行的隐修中嵌入了性别、身体、身份、欲念等主题，欲以“世法”与“佛法”互证互换，但结果却是双重的解构与消隐。

鲁敏对于都市生活的关注其来有自，事实上，在多年来的叙事探索中，鲁敏一直是一个“冒险主义者”。她不断“变形”，不断寻找新的叙事领域，为现代性进程中的都市生活源源不断地提供着新的面向。

■创作谈

《梦境收割者》里收有故事十则，全都写于我40岁以后。岁月如偷，偷走珍宝与花朵，写作者的沙滩上，留下的是坚硬的倔强，带着更朴素的纹路。

这10个故事里，直接以梦境为叙事对象与戏剧推动力的，仅一《有梦乃肥》。其余的都是现实主义的虚构之道，是跌滚于水泥地的泣血法则，是奔跑于芳草地的寄寓法则，是你我他它都至为熟悉、淹身其中的生活本体。故此，我收割的所谓梦境，乃是一种文学意义上的取景器，是理想色彩的孤独帜旗，是万种欲求的转构与解构，是醒来哑摸的抚心而惊，是那些殒精竭虑的时刻，是弦崩而断的弹荡与跳脱。

说句有点托大的话，我试图写出个体与时代的关系，在外部世界的雄阔节奏中，被媒介与流量裹挟的潮水中，微渺个体的频率与默然自持的姿势。我们的各样离合得失，其源头，都在我们与外部世界的相处，不协，妥协，或协调。

嗯对，我写了“当下”，几乎就是马路对面、热乎乎的故事，就像我曾经嘲笑过的那种热包子：大街或网路上快手采办一番耳目与食材，然后现磨面皮、现和馅，现生炊火现做包子，抵着嘴暗中使劲儿，搞了些褶子花边。做热包子是危险的，其危险不仅在于大家都熟悉、且过分熟悉那味道，更在于这显得凡俗、短浅，几乎与深刻高级雅正背道、自绝。城市经验物质经验欲望经验，是泥灰里的嫩豆腐，越是拍越是脏。

这没什么，我依然觉得自有其意义，不仅缘于迫切的书写愿望，甚至也认为这是淹身其中、与时代同行同走的职业道义。

写了监控摄像头。人们无时无刻不在凝视、同时也在被凝视，故而达成了几可谓深情暗对的监控摄像头。那深沉的球形与枪形监控头，它们没日没夜所刻录和抓取的，到底是什么？《球与枪》里，一个循规蹈矩的怯懦小职员，通过摄像头，实现了一个了不起的自我刷新。写了上山修隐，成者败者，中年人年轻人，都爱搬出来的一套佛系解隐，有一个精神至高点。写了曾经的一桩风化案件，时颇为震动，如一株长在我心里的“仙人掌”，怎么都绕不过去，想来想去，最终采取了全对话文体，有效避开了棘手也棘手的部分，顺带还致敬了我喜欢的曼努埃尔·普伊格，对，他的《蜘蛛女之吻》300多页，是绝对话体的长篇杰作。

写了倾慕文艺的商妇与诗人的昂贵私课，故事里有左右最习见的，肥胖的肉与物，贫瘦的心境，还原封不动选了几首外外的诗。南京诗人外外在2017年选择死去，韩东替他整理遗诗，在深夜的微博陆续贴出，我跟着一直看。我跟外外不熟，也不会写诗，只能读一点。小说写成，征求了诗人韩东的许可，故事里有一回慈善拍卖现场，悲想象的源头跟老韩有一点关系。以前我会竭力地面目全非地虚构，认为那是小说的尊严底线。这些年想法有变，或者说，胆子大了，觉得像这样跟真实肩膊搭背、藕断丝连的写法，也自有其文本上的边界拓展，是对“热包子馅”的一个测试。

《或有故事曾经发生》其素材就来自万能的万恶的朋友圈，有人贴了他女儿的照片，24岁，在风华浪誓的一个周末烧炭自尽。我写了她，有意没写死因。死因总是众声喧哗的，是想当然的。实际上我坚信，那一定是无人知晓、也不应知晓的。这小说里，有相当多叫人疲惫、像地铁那样拥挤的时下元素，带着写作者的忠实和轻微的厌恶，包括对非虚构写作的高仿与戏拟。这跟《写生》一样，是不同方向不同味道的“馅料”，我想刺探一下，对真实的贴近，近身到什么程度会让人不适，觉得大笨蛋了吗，还是构成一种透视的冒犯？与此同理，《赵小姐与人民币》，内容亦如题，写人与人民币这终身厮守痴缠的复杂关系，是怎么写也不够的，所以要短，它才5000字……而从所谓时代书记官角度而言，也不免会想象着，若干个年头过去，人们会从这一册小书里，得窥一幅幅彼时彼地的世情小景，并为之恍然失笑。哦，原来那时候，人们跟监控摄像头、纸币、诗歌、死亡、相杀、英语单词、慈善的关系是这样的呀。

假如要找什么共性的话，是这些故事的人物，相对来说，都处于一个略显孤绝的境地，顺流而下，听之任之，最是容易，逆流而上，哪怕仅是停止不动，做一个最普通的湮灭者，都需要莫大的勇气。他们有的干得不错，保全了小小但完整的自我，有的败于泥地，卷土而去，重又成为被分层、被指定的社会扮相。可这绝境中的努力是美的。我想致敬的，正是这种凡者之勇。

致潮水中的凡人
之勇

□鲁敏



■第一感受

罪案小说的另一种写法

□王春林

作家马举的长篇小说《孽缘》，是一部聚焦上世纪80年代拐卖妇女现象的罪案社会小说。作者以木佛县公安局展开的“打击拐卖妇女儿童专项行动”为切入点，对艳霞、翠芳和春梅三个如花少女被拐卖前后的遭遇进行了具体形象的文学书写。三个女性形象的苦难经历，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被看作是当时绝大部分被拐卖妇女不幸命运遭际的浓缩。以红婶为首的犯罪分子的最终归案伏法，标志着这次行动的顺利完结。与其他“打拐”小说的不同之处在于，作者既没有过多地强调“打拐”的艰辛与不易，也没有过分地谴责人贩子的丑恶与无耻，而是把更多的笔墨放在了被拐卖的妇女身上，对她们的命运沉浮进行了足够深入的思考与书写，不仅可以让整部小说在叙事层面上更加灵活自如，也能够让小说的主题跳出传统罪案小说那样一种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思维窠臼，并给读者留下无尽的想象空间。

人物形象的刻画与塑造是长篇小说《孽缘》艺术成功的一个方面，尤其是其中木佛县那位拐卖妇女的主谋红婶。虽然是一名犯罪分子，但红婶原本却也是吃斋念佛之人，她之所以没有能够抵挡住金钱的诱惑而走上犯罪道路，主要是因为法律知识匮乏以及自我控制能力薄弱的缘故。然而，红婶同时又是一个奇怪的罪犯。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如果按照常理，面对这样一位犯罪分子，不论是执法者还是老百姓，都应对其恨之人骨，咬牙切齿，都希望她能够迅速归案，并得到相应的法律制裁。但是红婶的情形却恰恰相反，她不但可以大摇大摆地行走于木佛县的大街小巷，而且还有着广泛的人脉关系和稳固的群众基础：“上至某些领导，下到街上的百姓，都保护她，维护她”。这就不能不让人心生好奇了。面对拐卖妇女这一恶行，红婶自己却也有着一套自足自洽的逻辑。当公安局的副局长斥责她买卖妇女，伤天害理，为了成全一些光棍汉而毁害了无数无辜家庭的时候，她却理直气壮地认为自己是“积德行善”：“女人总是要嫁人的，她们有了孩子适应下来就好了。我这是为山里人做好事，凡事哪有十全十美的！”除此之外，按照小说中的描述，红婶还是个热心肠的人，经常对左邻右舍无偿地施予援手。面对大家的困难，她总是该动用关系就动用关系，该垫钱就垫钱，“在乡邻们的眼中，她是个热心、大方的女中豪杰”。一方面，我们当然不会承认红婶的这套逻辑是正确的，但在另一方面，对那些生活在封闭、落后的大山深处的老百姓来说，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就是他们生活的座右铭。没有儿子，不能传宗接代甚至成了他们的奇耻大辱。也正因为如此，红婶的犯罪行为反而得到了他们的认同与拥护。但不管怎么说，对红婶这样一位身犯

重罪的人物进行书写，无疑是在“戴着镣铐跳舞”，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但作者马举却巧妙地把对红婶的评价权力交给了小说中的那些“买主”们，借他们之口，把一个客观的而不是作者主观判断下的红婶形象展示给了广大读者。这样一来，法律审判台上的红婶，与石佛镇众多百姓心目中的红婶，自然也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个人物构成相对复杂的人物形象，就凭此而跃然纸上。

最后必须提及的，是面对着艳霞、翠芳、春梅三个被拐卖花季少女的悲惨遭遇，作者也提出了生命的诘问：“被拐卖妇女在万恶的人贩子编织的一张罪恶的网里沉浮，无论是不是被解救，在这张网里结下的孽缘都会留给她们一生的痛苦，她们永远无法真正地脱离苦海。”对大多数被拐卖的妇女来说，无数次的反抗、逃跑与无休止地承受折磨是她们必经之路，只不过有的如小说中的艳霞一样，在反抗、逃跑、解救都无望，又无法接受现实生活现实的情况下，最终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有的如翠芳，历经波折后遇到好人家，在没有其他选择可能的情况下，“自觉”接受命运的安排；有的如春梅，被幸运地解救，开启人生一段新的历程。但无论是其中的哪一种，都会令人身心无限的哀婉与叹息。“人最宝贵的就是生命，生命对每个人来说只有一次”，面对这仅有一次的生命，她们甚至来不及思考，就已经彻底葬送了人贩子手里。更悲惨的是，她们在被拐卖后，大都成为了“购买者”传宗接代的工具，被迫在鞭笞与屈辱中生育儿女。而这些无辜的生命，宛如钉在她们生命耻辱柱上的标记，永远无法被抹去。艳霞虽然纵身一跃，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她也许认为这样就可以一了百了，为自己短暂而不堪的生命历程画上永远的句号，但事实上她的儿子石头还在，她的屈辱也并未结束。相对来说，春梅算是比较幸运的，在被成功解救后，不仅继续完成了自己的学业，还找到了心仪的工作，组成了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但历史是无法洗刷的，曾经的儿子旺财突然出现，打破了她生活的平静，她心里“再也没有踏实过，心一直高高地悬着”。旺财犹如她生活中的一颗定时炸弹，随时都有可能被引爆。况且，即使没有旺财的存在，只要是一个正常人，谁又能在内心中彻底埋葬自己的过往经历呢？即使像翠芳那样，不仅貌似心甘情愿地“接受”了现实，而且还做起了村里的妇女主任，但我们又怎么能够忽视她内心深处无奈与绝望呢？与那些动辄就讨回来的媳妇拳打脚踢的光棍相比较，老闷的确算得上是一个好男人。他不仅不强迫翠芳，而且当村民们在“五婶”的带领下，打着除妖的幌子欺负翠芳时以死相拼，极力保护翠芳，甚至还曾经主动放走翠芳。但是请注意，翠芳的最终留下，并不是因为她真正地喜欢上了老闷，喜欢上了这种生活。她只是清楚地知道，自己即能够逃离出去，最终也是无路可走。不论是回家还是隐姓埋名重新生活，都无法抹去她曾经的屈辱经历，她可以欺骗别人，却无法欺骗自己。留下来，既是她没有选择的选择，也是她对自己残缺不全生命最好的慰藉。

综上所述，《孽缘》既是一场“打拐”行动的赞歌，更是一曲被拐卖妇女的生命悲歌。无论如何，都应该被看作是一部聚焦拐卖妇女现象的优秀罪案社会小说。

■短评

回忆与现实交织中的生命悲歌

——评汤成难《摩天轮》

□苏辰歌

汤成难的小说《摩天轮》塑造了一个在宿命压迫下的不幸女人，她用生命的韧性抗争命运，身处重压之下却从未放弃追寻幸福。小说以女主人的回忆为主线，着重表达女主人的自我意识和情绪，意识流特征十分显著。小说以摩天轮这个客观存在为现实，在这个空间里让女主人的情绪不断游走在现实与回忆之中，独特地表达了作者对人生、人世的哲思。

小说开头写了一场阴沉滂沱的大雨，女主人的生活也好似这场暴雨后的潮湿、泥泞而坎坷。怯懦内向的性格、并不富裕的家庭、患病的女儿，让她甚至连坐一次摩天轮这样微小的心愿都因为种种外界和自身因素影响而不能达成。最后，丈夫和女儿意外身亡了。“不幸”是贯穿她生活最浓厚的底色，她的生命有一种宿命般不可逃脱的悲凉。按常理说，人在这种灵魂和肉体的双重折磨之下大抵会颓废惶惶，失去对生活的希望。

然而，细读文本，可以看出女主人在生活的重压之下并没有对生活完全丧失希望，在她的心底深处一直保持着对幸福生活的强烈渴望，而这信仰一般的渴望支撑着她站起来，与命运对抗。小说在开头描写了一场不同寻常的冬雨，女主人在暴雨中蹬着脚踏车艰难地与风雨抗争，暴雨在这里是生活中压迫和苦难的象征。面对风雨，女主人公并没有退缩，她选择直面风雨，迎难而上，可是结果怎么样呢？尽管她努力地去抗争，可是她的车子却陷入泥中“纹丝不动”，这里体现出作者对宿命意识的认同。

女主人公一生中有多次尝试接近摩天轮。第一次是20年前，她鼓起勇气邀请同在游乐园独身小男坐摩天轮。她对追寻幸福是如此执着，作者生动地描绘出一个怯懦的年轻女子，在接近一直渴望的幸福时那种紧张和激动的心情。然而在幸福触手可及的时候，变故横生，她被家长误认为是拐卖孩子的骗子，乘坐摩天轮的幸福憧憬第一次破灭。第二次接近摩天轮是在她有了女儿之后，“她似乎迫不及待地等待女儿出生，长大，大到可以坐摩天轮的年纪”，小说阴郁灰暗的基调在此时有一丝光明闪现。然而，作者却把她希望的泡沫残忍地打破。她的女儿天性胆小，还没坐上去就一阵狂哭，后来，才检查出她女儿患有癫痫。她对幸福生活的愿景第二次破灭了，并且比第一次破灭得更加彻底。第三次是在现实生活中，她想要伸手触碰水中摩天轮的倒影，但是汽车疾驰溅起的水将倒影虚晃了。每一

次当她努力地上攀，就快要接近幸福之时，生活总是在这一刻给她重重一击，让她狠狠跌落在地。似乎有一只无形的手在背后操纵一切，悲感离合、生死存亡，但无论如何却永远看不清那是怎样的招式以及手背后的面孔，宿命是产生悲剧的源头。“摩天轮如同巨大的时钟，不知道是什么操控着这巨大轮子，她正是指尖上那个小小的点”，女主人在摩天轮这个空间里突然感悟到这个道理，人世无常，生命之轻。

作为时代下芸芸众生中的一个微小人物，女主人公是千万个平凡人的缩影。在生活中，人们或多或少承受着命运的无常与压迫，可预知与不可预知的苦难，但是作者并非只想表达一种虚无主义的悲观无力感，她想通过女主人公传递的，是人在面对压迫时反抗而体现出的生命的韧性。女主人公在摩天轮上遥望自己的家，这种全新的视角使她回忆起自己曾多次穿过厨房的窗户凝视摩天轮。窗口是通往希望的通道。摩天轮是女主人公向往幸福生活的物化寄托，视野中可见的摩天轮画面的逐渐变少，与前面她三次接近摩天轮却都失败的情节相呼应，喻示着希望在生活的压迫下逐渐消逝，追寻幸福道路愈发艰难。尽管追寻幸福之路十分艰难，但是女主人公借助各种手段，仍然坚持透过窗户看摩天轮，哪怕只能看见短短的一截。看似是对摩天轮怀有执念，实则是她对幸福与希望的渴求强烈。作者给她起的性格特征定义是怯懦，但通过这些文字的描写，我们却能在这个懦弱平凡、饱受磨难的女人身上看到生命韧性的伟大。用残酷的笔书写对生命韧性的赞颂，是作者想通过这部小说抒发的对人生、人世的深刻哲思，体现了作者对人类的怜悯和终极关怀。

小说的一个亮点是用摩天轮转动的一圈比喻人的一生。在摩天轮转动的过程中，作者在这个狭小密闭的空间里，让女主人的思绪在回忆和现实之间反复游走，现实主义和意识流色彩十分显著。摩天轮上升过程中看到的外景触发她对过去的回忆，然后再由回忆切换到现实，二者循环往复。作者把摩天轮转动时所见的景色联想为自然的四季，春夏秋冬分别象征着人的幼年、青年、壮年和暮年，将以线性方式存在的时间“立体化”于这一隅狭小的车厢之中，以一种近乎分裂的时间体验表达作者错位纷乱的思绪、激动复杂的感情。人的一生就如摩天轮般周而复始，从出生到死亡，然后迎来新生。